

第四章 影響台灣發展之外部因素

第一節 全球化現象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全球化是範圍廣闊的進程，它受政治力與經濟力的聯合推動，除了建立國際間新秩序與力量對比外，也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¹全球化指的是現代世界體系中，國家與社會間之結合與聯繫的多樣性，它所描述的是一種過程，發生在世界某端的事件、決定和活動，對世界另一端的個人和社區有顯著性影響的過程。²全球化所代表的不光是經濟全球化，尚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全球化正在使社會組織產生轉變，此代表全球化不僅使人與人間、國與國間經濟關係產生轉變。也使社會互動方式、生產關係產生革命性變化，嚴格說來，全球化所代表的另一深層義意是，人類社會組織的變遷過程，通訊與網路徹底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定義與範式。但經濟全球化只是全球化諸多面向之一，再者，全球化的影響並未如有些觀察家所認定般的廣泛，國家政策與國家經濟依然是經濟事務主要的決定因素。³

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確實產生莫大的衝擊，衝擊包括決策衝擊，制度衝擊、分配衝擊與結構衝擊。⁴全球化是多樣化跨國過程與國內結構之綜合體(coalescence)，容許一國之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型態穿透另一國。惟若據此認為無疆界市場就此成形，則又犯了化約主義的誤謬，全球化使國家與市場的大爭論再度出現，此代表重商主義與自由主義又重回主戰場。全球化可視為是自由主義邏輯的推展，以自由市場、經濟、金融全球化為前導，再次與以國家為首的重商主義，在理論與實際上展開爭戰。如過去一樣，兩者的勝負不會在短期內便顯現出來，但國家與市場隨社會生產要素的轉變，勢必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再加上資訊、技術、科技的急速複雜聯結，都將使國際關係、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進行結構性、革命性與全面性調整。

網絡社會的崛起是此種關係之結構、解構與建構的過程的展現，⁵筆者以為此種趨勢係延續普蘭尼在「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思考脈絡而來，

¹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鄭武國譯，**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 (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台北：聯經，1999年)，頁33-39。

² 宋興周，「全球化：論述、迷思、或典範」，收錄於，顧長永主編，**全球化與區域化：台灣的觀點** (台北：翰蘆出版，2003年)，頁38。

³ 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譯，**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台北：桂冠圖書，2004年)，頁1。

⁴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Perraton, J., 著，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陳淑玲譯，**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台北：韋伯文化，2001年)，頁23。

⁵ Manuel Castells 著，**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三卷**，頁9。

普氏認為西方世界對死亡、自由與社會的認識，是西方世界主體意識，普氏期望社會主義社會，鄙視市場的理念，他企圖藉由資本主義的基礎，重建一套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式分析，⁶使資本主義不再往獨裁路上發展，如若干學者所說的，全球化市場也有獨裁之虞，全球化市場對後進發展國家是一刀兩刃，好壞參半。

全球化對傳統民族國家的統治方式、統治條件造成影響是不爭的事實，國家再不能漠視來自民間社會的需求，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過去由上至下的統治型態與邏輯，面臨嚴峻的挑戰。事實上，全球知名學者早已對全球化現象進行全面性討論，學術界對全球化的界定可概分為兩類，贊成者如大前研一(K. Ohmae)、佐恩(M. Zurn)認為全球化已侵蝕傳統國家的權威，並已危及有效治理的可行性，反對者如赫斯特與湯普森(Hirst & Thompson)、韋德(Robert Wade)、加略特(G. Garrett)則認為，不應對全球化的新奇與程度過分的強調，國家仍是國際關係發展的主體。⁷但可以確認的是，全球化與區域化這兩股近似相對的力量，正在模塑世界經濟，全球化--是跨越國界之經濟關係的發展與強化--加速全球互賴性；區域化則代表國家以制度性合作方式，提昇彼此商業利益，經由加強彼此的合作，降低來自全球化的壓力。⁸全球化與區域化代表世界權力的集權化與分散化，筆者以為，如前所述，不可對全球化過分期望，全球化對後進發展國家容或是個利基，後進發展國家可能因全球化而迎頭趕上先進國家，但後進發展國家更可能在歐美強國架構下--全球化中永遠沈淪，為確保台灣在後威權時期不會被全球化迷思所稀釋，不致被全球化所撕裂與邊緣化，重新思考與定位國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是有其必要的。⁹ 在全球化過程中，有必要重新定義國家之角色與功能，但國家角色不必然如有些學者所言功能全失

過去美援是影響台灣發展最重要的外在大因素，目前台灣所面臨的情形和其他國家一樣，就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國家競爭力，維持本土論述。全球化壓縮社會關係的時空面向，全球化是市場驅動，而非政策驅動過程。¹⁰ 全球化解決的問題，就如同它產生的問題一樣多，我們不可對全球化隱藏下的大國國家利

⁶ Ploany,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p11.

⁷ Golub, Jonathan. “Globalization, Sovereignty and Policy-Making—Insights from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Holden, Barry. edited. *Global Democracy—Key Debates* (Routledge, 2000), pp180-201.

⁸ Barry, Donald and Keith, Ronald C. “Introducti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Barry, Donald and Keith, Ronald C. edited.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Trade* (UBC Press, 1999), p3., 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等著，楊雪冬等譯，*全球化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39-42。

⁹ 洪鎌德，*社會學* (台北：揚智文化，1998年)，頁162。

¹⁰ Mittelman, James, H. “Th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in Mittelman, James, H. edited. *Globaliz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3.

益掉以輕心，對去管制化、自由化、國際化須重新加以評估。由國際組織的運作，區域發展的發展趨勢，可清楚看出，權力仍是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主體價值，筆者也認為，掌握權力面向，才能瞭解後威權時期台灣發展方向。

全球化突破地緣政治論述，民族國家實質的疆界被通信技術、科技穿透，各種外於國家的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結合網路先進科技，與民族國家進行權力分配機制的爭奪。運輸、社會溝通、科技與工業組織的發展，已同時對不同的政治組織造成壓力，期待進步、較好的生活水平、社會正義，已成為大多數社會的共識，再者，互賴已漸成共識，也造成跨國組織與聯盟的壓力。¹¹歐美先進國家希望經由全球化打開全球市場，以自由市場為工具，維持其宰制全球資源的優勢地位，但後進國家則認為全球化是其脫離受殖民、受壓迫宿命的大好時機。正如梯里(Charles Tilly)所說的，促進國內市場的產生，已類似成爲一種國教，如果抵制它，就是一種罪惡，而投入全球市場更不可落人之後。¹²全球化雖造成經濟全球化的出現，突破國與國間之政治疆界，但權力集中現象，及其所產生的殖民壓迫性並未消逝，而且有加劇與惡化傾向，全世界貧富差距持續擴大。¹³1999年年底世界貿易組織於西雅圖舉行部長會議期間，數以萬計抗議者擁上街頭抗議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失業等問題。¹⁴全球化確實仍存在無法迴避影響深遠的負面效應。¹⁵大部分的人並未蒙受全球化之利，反倒是失業已成全球化最爲人詬病的現象。

本土化之論述與發展，則是後進國家爲避免被邊緣化與再度殖民化的發展過程。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就認為，全球化不是單一過程，而是各種過程的複合體，其所呈現的是一種相互矛盾、衝突、不和諧以及新的層級形式，本土民族主義的復活和本土認同性的增強，與全球化力量呈現既合作又競爭態勢。¹⁶全球化確實改變了國家的性質，與國家疆域內人民的生活。¹⁷全球化在某些方面，確

¹¹ Geertz, C.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63), p108., Watts, R. L. "Federalism, Regionalism,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D., Cameron. edited. *Regionalism, and Supranationalism*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1981), p3-4., Simeon, R. and K. Swinton. "Rethinking Federalism in a Changing World," in K. Knop, S. Ostry, R. Simeon, and K. Swinton. edited. *Rethinking Federalism: Citizens, Markets and Governments in Changing World* (Vancouver: UBC Press, 1995), pp3-11.

¹² Migdal, J. (1988), p93.

¹³ 1998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頁30。

¹⁴ Worthington, Richard.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Production, Politics, Actions* (Peter Lang, 2000), pxi.

¹⁵ Went, R. *Globalization—Neoliberal Challenge, Radical Responses* (Pluto Press, 2000), p43.

¹⁶ Anthony Giddens 著，李惠斌、楊雪冬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5。

¹⁷ Barnett, Richard & Cavanaugh, John.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427.

實使國家權力受限，但國家在其他領域的角色卻變得愈來愈重要了。¹⁸

當國際社會行動的主體除了民族國家以外，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也成爲國際社會重要行動者時，政府就有必要重新思考與型構國家未來的整體發展，國家、社會、人民與國際組織彼此間的互動模式如何加以解構再建構，如何由威權解構進入民主建構？國際社會中的民主互動結構，對台灣後威權的國家社會關係的影響爲何？政府在追求新國家的建構過程中，應以何種方式與心態面對外於國內之國際因素，才能確保永續發展，是探討全球化無法迴避的問題。全球化使一個國家在制定重大政策與發展策略時，必需同時考量國內、國際因素互動之聯結性，國家再不能以單一邏輯思考，面對外界的需求與挑戰，全球化是變動不居的過程，非國家行動者如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ATA)、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加入全球化，而衍生出的「全球治理」問題，不僅加深國際強權與國內的衝突，同時也使後進發展國家倚賴先進國家愈深，貧富差距加大。

全球化現象對台灣發展與轉型當然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因爲台灣屬後進發展類型，本身的發展事實上只能適應與迎合國際分工體系，而全球化最顯著的特徵便是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現象突破民族國家固有的疆界領域，全球化是跨疆界之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關係的強化。¹⁹「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是互爲表理的概念。「經濟全球化」聚焦於全球的國家與市場上，而「全球治理」所涵涉的範圍則在全球政治變遷上。全球治理在全球變遷上之主要研究取向有四：首先，羅森腦(James Rosenau)提出「權威位置轉移」(the location of authority)概念。全球變遷是包羅萬象的現象(encompassing phenomenon)，全球化過程爲「一種普遍趨勢…權威位置、控制機制之地點，在每個大陸上都出現重大轉折，此種轉折出現在經濟、社會系統，如同出現在政治系統一般」。²⁰…「此種過程是多方向的同時擴散，既是從屬於國家，也超越國家界限，是國際性的，也是全球性的」。²¹全球治理的概念是涵涉多面向之權威重建趨勢。第二，全球市民社會的出現。此與 1980 年代東歐異議運動息息相關，霍克(Richard Falk)認爲，由全球市民社會可發現「人本的全球治理」的根源。第三，在重建全球政治經濟過程裏，G-7 區域內之主要知識份子、企業與政治精英扮演重要角色。考克斯(Robert W. Cox)主要貢獻便在於對跨國社會力量整合至國際關係進行研究。第四，全球取向之知識

¹⁸ Hobsbawm, Eric. "Guessing about Global Change,"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47 (1995), p43.

¹⁹ Holm, H-H & Sorensen, G. *Whose World O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1.

²⁰ Rosenau, J.N.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 1(1995), p18.

²¹ Rosenau, J.N. "Distant Proximities: Dynamics and Dialectics of Globalization" in Hettne, B. edit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Global Disorder* (London: Zed, 1995)

精英與權威，尤其是資訊業精英扮演主導全球化發展的重要角色。羅森腦由整合與分化之微觀面向，研究治理之再定位，是研究面向最廣的一位，其他人強調的則是特定的全球變遷之意涵。

全球化觀點依學者研究焦點差異，而出現文化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與政治層面的全球化定義，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眾說紛紜的觀點中，國家再也無法漠視外於國家之團體、組織對國家發展的制約。若全球體系仍是單純由國家體系所組成，則全球體系是不會對國家體系構成威脅的，但日益增強的跨國滲透性(transnational interpenetration)已對國家體系造成結構性改變，此種結構性改變過程，為全球化核心，更是多層次現象。²² 全球性與本土性是並行的，全球性決定本土性的一些活動，但本土性也並非全然被動完全受制於全球性，也能對全球性進行一定程度的反制約。²³ 矛盾的是，全球化本來想製造出更大的經濟圈整合世界性市場，但卻同時出現了本土性論述，在全球化過程中，尚未出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的世界村，反倒是出現了地方主義現象。²⁴ 全球化並非只是單純的科技與經濟變遷過程，而是由意識型態、選擇與國家意志、私人企業與廣眾(wider publics)共同推動的政治過程。²⁵

贊成全球化的學者認為，全球化藉由貿易的增加、新科技、外資與媒體與網路為全世界的人民與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而反全球化者則認為，全球化並非新生現象，²⁶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正常運作，只是資訊革命改變了生產力與生產方式，進而改變了人類互動的方式，國際間的交往也都產生了革命性的轉變。全球化已成為世人眼中無可逆轉國際潮流，舉凡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皆納入此一洪流中，好似全球化已吞噬民族國家的國際生存空間，民族國家已成歷史陳跡，已無法在國際社會再激起任何漣漪。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組織的成立更加深世人此種印象。惟全球化之現象、範圍、作用似有被誇大之嫌，在界定及意義上受到了曲解，全球化並非一嶄新現象，事實上除了因資訊科技加速全球化現象外，全球化早在十九世紀便已出現，如果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自然發展結果的話，那全球化實有言過其實之嫌，全球化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延伸而已，是西方強權第二次殖民的過程，而跨國企業、多國籍企業與資金流動是加速此波全球化的主因。全球化更激化南北發展的差距，全球化過程使資源、財富

²² Phillip, Cerny. "What Next for the State.," in Kofman, Eleonore and Youngs, Gillian, edited.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Continuum, 2003), pp207-221

²³ Arif Dirlik 著，王寧譯，*後革命氛圍*，頁 23。

²⁴ Baldacchino, Godfrey & Milne, David. *Lesson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mall Islands — The Resourcefulness of Jurisdiction*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2000), p237.

²⁵ Phillip, Cerny. "Globalising the political and politicizing the global: concluding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s a voc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4 (1), (1999), pp147-62.

²⁶ Roberson, R. (1992), pp58-60.

與通路更分配不均勻，更增加全世界剝削、壓迫現象。²⁷

全球化不僅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經濟全球化現象，更重組了過去福特主義資本積累方式與整個生產結構，資訊科技與通信設備促使金融、資本、勞動力形成快速流動網路虛擬空間。在由福特主義進入後福特主義後，國內之經濟、社會與政治與外部之環境關係已進行再重組、再解構與再結構是必然的趨勢。全球化對過去以疆界領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衝擊極大，民族國家無法對金融、資本、勞動力之流動性完全加以掌控，國家主權受到侵蝕，但國家並未被取代，或就此消失，相對地，全球化提昇了國家的功能，國家的重要性仍然存在。²⁸佛格森(Marjorie Ferguson)認為，國家的力量並未弱化，而且還扮演著聯繫全球—在地權力的中介機構(nexus)。²⁹國家雖然已不是國際社會中唯一的權力主體、唯一行動者、唯一權威，³⁰但隨著本土化論述的強化，後進國家對於全球化也並非完全接受，全球化中的殖民論述，再度成為世人關注的重點。

全球化至今仍眾說紛紜，赫斯特(Paul Hirst)與湯普森(Grahame Thompson)以貿易量的量化對全球化進行分析，認為現在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只是國際化而已，民族國家並未因全球化而喪失其重要性與活動能力。或許，赫斯特與湯普森如提出世界體系的華勒斯坦一樣，太過於重視經濟因素的影響力，而輕忽政治、文化面向的影響，但也確實道出權力與財富不變的本質，全球化藉由資訊無遠弗屆穿透空間的能力，將國內與國外的政經互動模式、新生活型態、價值觀傳播至大眾生活的每一層面，全球化不僅深深地影響人類的思維方式，也對國家與市場的辯證，重新找到新的論證空間。全球化過程所代表的意義與影響層面，是無法以單一因素加以掌握的，全球化是多重因素聯結互動的結果，全球化將政治學最古老的國家與市場問題再次加以突顯與深化。故全球化在本質上應為多元的、雜亂的，並經常是極為不對稱的，全球化過程中的本土化現象仍將存留相當長的時間。³¹

²⁷ Bende-Navende, Anthony. *Globalisation, FDI,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Ashgate, 2002), pp1-8..

²⁸ Rosenau, James N.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 轉引自，星野昭吉著，劉小林、梁雲祥譯，*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為主體與結構*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57。

²⁹ 劉世鼎，「全球化理論批判—許勒與佛格森的理論」，*當代雜誌* (台北)，第一五三期／復刊第 35 期 (2000 年 5 月 1 日)，頁 34。

³⁰ Anderson, James. "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Nation-State," in Anderson, J., Brook, Chris. and Cochrane, Allan. edited. *A Global World?: Re-Ordering Political Sp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3. 轉引自，星野昭吉著，劉小林、梁雲祥譯，*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為主體與結構*，頁 56。

³¹ Baldacchino, Godfrey & Milne, David. *Lesson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mall Islands — The Resourcefulness of Jurisdiction*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2000), p239.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延伸，只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不同而已，資訊、電腦成爲主要的生產工具，但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隱含的不均衡、剝削等問題並未因爲全球化而解決，不均衡發展與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經濟全球化確實使得民族國家過去獨享的政治權力，遭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但若說全球化已使民族國家完全走入歷史又有點言過其實。許勒(Herbert Schiller)指出，戰後帝國主義的擴強，以跨國企業爲行動單位，而不再以國家爲行動單位，透過母國的協助，跨國企業滲透發展中國家，並大舉輸出资本、商品、科技、高階經理人、商業管理模式以及影響層面深遠的消費至上主義。³²或許赫爾德(David Held)的說法較爲中肯，過去由國家享有之無限權力，目前是由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區域組織共同分享。全球化尚難得出大家共同認可的概念，全球化或許只是個過度濫用虛擬化的概念而已，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現象的補充說明而已。

全球化是一複雜的概念，可說是藉由資訊科技的快速流動特性，對目前各國間異質性相當高的文化、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社會現象與實體進行跨國聯結，追求國際社會均衡發展的現象。全球化研究可概分爲三個主要學派：(一) 超全球主義論(Hyperglobalizer)。(二) 懷疑論(skeptics)。(三) 轉型主義論(transformationalists)。超全球主義論者大前研一(K. Ohmae)認爲經濟全球化發展，已使市場法則主導人類社會的發展。懷疑論者赫斯特(Hirst)與湯普森(Thompson)則認爲，全球化是種迷思，全世界已發展成爲三大經濟區塊，而國家仍爲主要行動者。轉型主義論者羅森腦(James Rosenau)與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則認爲全球化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全世界的國家與社會，正極力適應此高度不確定性的變化，經歷一種深刻的社會變遷過程。³³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倪世雄表示，全球化是世界發展至一定階段的一種趨勢，而且大部分的西方全球化立論皆帶有明顯西方中心論或美國中心論的看法。³⁴

筆者認爲，就如列寧所說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正常擴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資本主義擴張的本質是全球化現象的基本動力。儘管經濟全球化被認爲是自由化的全面勝利，但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剝削現象並未見稍戢，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情況。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後進工業化國家僅管在自由化過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本身可能淪爲強國的附庸而不自知。全球經濟化並未使這些國家脫離被剝削的狀況，反而有被邊緣化的危

³² 劉世鼎，「全球化理論批判—許勒與佛格森的理論」，頁 30-31。

³³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Perraton, Jonathan 等著，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陳淑鈴等譯，**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頁 3。

³⁴ 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頁 46-47。轉引自，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2001 年)，頁 478-484。

險。在全球產品分工體系下，處於出賣勞動力的一群，仍未脫離被奴役的宿命。資料顯示，1960 年代全球最富有人口收入是最貧人口收入的三十倍，1990 年以後，全球最富有人口收入反增至是最貧人口收入的六十倍之多。³⁵經濟全球化並未使較低度發展國家提昇其國際分工位階，反而淪為強國剝削的附庸地位。就以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而論，台灣在 50 至 80 年代成功的經濟發展經驗，仍未脫離全球資本主義的制約與壓迫，台灣仍是半邊陲國家。台灣以出口導向代替進口替代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配合當時美國國內市場需求，時至今日，美國對台灣發展的制約性仍未稍戢，嚴格說來，台灣仍是高度依賴美國之依賴性發展。

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可視為一種經濟決定論，核心國家剝削邊陲國家，邊陲國家永遠是種依賴式發展。惟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對華勒斯坦之世界體系理論過份重視經濟因素，輕忽人類因素(human agency)的提法表示異議，羅伯森不認為全球化是一種體系，他認為全球化應是種場域(field)，而矛盾與挑戰使場域中充滿吊詭，此場域是社會生活中全球、國家與地方或個人面向相互滲透的複雜組合。³⁶羅伯森非以政治經濟學觀點從事全球化研究，而是以現代化理論與宗教社會作為全球化之基本觀察點，對他而言，全球化不單是結構、制度與網絡而已，而是對社會生活的思考方式與我們所處的位置，如圖 4-1。³⁷

³⁵ Zolo, Danilo. "The Lords of Peace—From the Holy Alliance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in Holden, Barry. edited. (2000), p77.

³⁶ Holton, Robert J.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187.

³⁷ Holton, Robert J.(1998), p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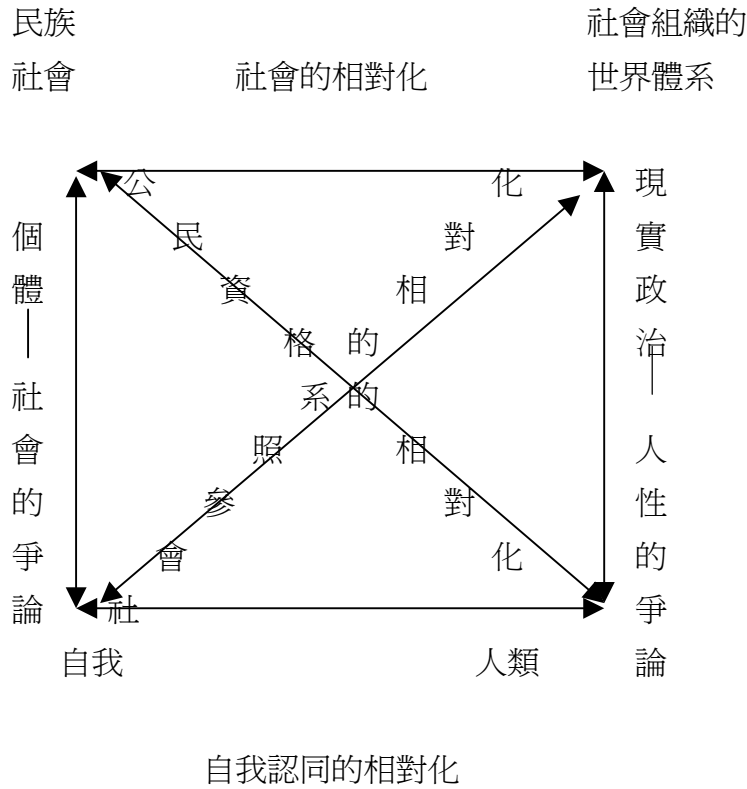


圖 4-1：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son)的全球場域

資料來源：Roberson, Roland 著，梁光嚴譯，**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39。轉引自，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 (台北：創世文化，2002)，頁 225。

羅伯森視全球化為不同生活形式的互動，而非跨國力量宰制國內，或是現代性戰勝傳統。羅伯森想要整合巨觀與微觀全球化的距離，由圖 4-1 中可以看出，四個角落分別為民族社會(national societies)、自我(selves)、人類(humankind)與社會組織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 of societies)，首先，羅伯森強調社會生活的多面向性(multidimensionality)，其次，他強調互動、辯證的本質，羅伯森很顯然是要將全球化由政治經濟理論範疇，引導至文化範疇，儘管羅伯森的文化面向全球化論述有其限制性，但其強調的多面向性，避免全球化掉入解釋化約主義則是有貢獻的。文化因素對國與國間關係的影響愈來愈顯著，就以歐美國家與阿拉伯國家、亞洲國家間新國際關係架構看來，文化因素在未來全球化／在地化過程中勢必扮演重要角色。羅伯森的 global field 概念，對於台灣在全球化過程中所追求的本土化

運動具啓發性意義。

美國學者馬哲爾(M. J. Mazarr)將文化影響國際關係分爲四種模式：(1) 文化是決定國家、民族和個人經濟的關鍵性因素。(2) 文化環境和信仰體系長期影響著國家領導人決策思維模式。(3) 文化是社會組織的設計藍圖。(4) 文化是國際關係的主要架構、國際事務、國家行爲的重要基礎，國際衝突的原因。³⁸柏格(Peter Berger)提出四種不同的文化全球化過程與現象，而且跟本土文化互動，包括(1) 國際企業精英文化(Davous Culture, 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ulture)。(2) 全球通俗文化(McWorld Culture, or global popular culture)。(3) 全球學術精英文化(Faculty Club international, or world intellectual culture)。(4) 通俗宗教文化(New Religious Movement, or popular religious culture)。此種文化從 1980 年代開始，就在台灣出現，而且促使台灣的文化型態接近想像中的全球文化。³⁹蕭新煌表示，此四種文化領域，在台灣全球化與本土化經驗中是多元共存的(multiple coexistence)，國際企業精英文化與全球學術精英文化，兩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融合現象，全球文化既沒取代本土文化，也未遭逢嚴重衝突與抵抗。政府在這些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一方面在促進與推動本土企業與本土通俗文化全球化上扮演關鍵性角色，一方面引進全球學術精英文化，但在新宗教教派方面，則保持較為模糊的態度，對於民間團體，包括知識份子、文化事業與宗教事業，政府較為被動，沒採主動態度，大致上政府是配合民間團體各種本土化力量的要求，再據以採取行動。⁴⁰

「文化多元性認同」是在社會實踐與文化交流中達成的，政府在追求新國家建構過程，最後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政治意識型態，而在於國家與人民對社會文化的態度。上述四種文化全球化面向，將對台灣新國家建構發展造成影響，因為在一種文化實踐中，都存在一種共同的認同意識，如果一種文化的認同，係根據與其他文化認同的相對性而建構，那麼其他文化可能會形成某種程度的干預，進而影響自我認同的目標。在文化全球化中，一個文化面臨另一文化時，基本上有三種基本態度：(1) 強調自己文化的普遍性，並否定他文化的相對性。(2) 承認其他文化的相對性，但會因權力關係的調整，導致其他文化的滲透，而激起本國文化的防禦性。(3) 在不喪失自身文化的獨立性，以更大的文化寬容態度涵孕成範圍更爲廣闊的文化。⁴¹自李登輝主政以來，台灣本土意識便水漲船高，中國大

³⁸ 丁志剛，「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利益的認證與維護」，收錄於，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頁 54-56。

³⁹ 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柏格(Peter Berger)主編，王柏鴻譯，**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Many Globalizations)**(台北：時報文化，2002 年)，頁 38-39。

⁴⁰ 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柏格(Peter Berger)主編，王柏鴻譯，**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Many Globalizations)**，頁 56-57。

⁴¹ 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社，1998 年)，頁 95-96。轉引自，翁明賢著，**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頁 234。

陸與大中國文化意識便成爲台灣我文化的對立面—他文化，中國文化成爲一種禁忌，外省族群反成爲台灣本土文化的邊緣人，在政治權力運作下，無法完全融入台灣本土化文化之中。在全球化過程中，文化多元性應是主流趨勢，台灣社會反出現狹窄心態的文化排他性，此決非正常現象，若再加上民粹色彩，則文化包容性將消失殆盡，台灣的本土論述也將成爲威權意識型態的工具與傀儡。本土化與全球化本是不相違背的發展趨勢，彼此互相鑲嵌，具互補性，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便會出現不同類型的文化類型與國家發展，但若本土意識反而加深與強化國家與民間社會間的不信任感，甚至割裂個體與群際間的共識，則國家的政治穩定性與政府的施政有效性都將受到衝擊，這是政府不得不加以正視的問題。

自東歐民主化、蘇聯解體後，美蘇兩極對抗的國際體系轉變爲多極體系，整個國際政經發展脈動與動力產生革命性轉變，全球資金、人力、資訊快速流動，經濟全球化現象對國際社會中，國與國間的互動功能產生巨大沖擊，國家不再是國際社會唯一行動者，僅管國家仍是主要行動者，但其某些邊陲功能卻必需與其他行動者分享，如非政府組織，政府間組織與超國家組織。在探討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消長情形，應對國家的基本功能與內涵重新加以梳理，才能掌握全球化對國家之主權、權力與自主性的影響，國際社會與國家內部的互動，已將影響國內、國外因素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論述國家的角色與功能時，必需通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以及國家與全球體系的關係加以研究。⁴²誠如麥格魯(Anthony McGrew)指稱，經濟全球化所代表的是，國家之間以及社會之間多元性經濟的聯繫與經濟的相互聯合，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範圍的擴大，與經濟程度加深這兩個向度上的經濟現象。⁴³ 面對大國結盟、小國衝突、全球化與本土化交錯的複雜環境，台灣如何融入全球化潮流，又能堅持其本土化論述，如何能不受制於大國外交，又能維持本身發展的自主性，是台灣本土化論述無可迴避的難題。

自李登輝掌權以來，台灣因應全球化出現兩條路線，國民黨的「南北縱橫」—北聯日本，南向東協的雁行發展策略，與民進黨的「東西橋樑、海陸介面」的「大膽西進」，後來轉化成爲「強本西進」政策。⁴⁴但國民黨的「南北縱橫」遇上 1997

⁴² 星野昭吉著，劉小林，梁雲祥譯，**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爲主體與結構**，頁 11-12。

⁴³ McGrew, Anthony G. "Conceptualizing Global Politic," in McGrew, Anthony G., & Paul, Lewis E. et al.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1-20. 轉引自，星野昭吉著，劉小林，梁雲祥譯，**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爲主體與結構**，頁 123。

⁴⁴ 「大膽西進」政策是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爲首的美麗島系所提出。在政治，以「歷史終結論」出發，順應世界潮流，不論爲國際異端，不挑戰國際現狀，不刺激中國，不談台獨，在經濟上，接受自由經濟觀點，以投資中國爲主軸，帶動台灣產業升級。形成一種「經濟實體化」，政治

年亞洲金融風暴，而民進黨「強本西進」在李登輝「戒急用忍」政策下難以施展。⁴⁵無論是經濟上的「大膽西進」或「強本西進」，或政治上的「兩國論」、「戒急用忍」，台灣都面臨建構主體意識的困境，尤其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已與本土化的族群認同對應起來，以「去中國化」為主權主體論述的目標，其實台獨充其量只是種合理政權統治性的工具，是種政治意識型態，台獨所代表的更深一層的文化意義，應是台灣人民脫離殖民統治的歷史命題的延續，「去中國化」是台灣人民為免於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的具體行動。

李登輝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採取與中國對立的態度、立場，並於 1999 年提出「兩國論」，在涉外事務上，提出務實外交，在經濟上採取「戒急用忍」政策，並以台灣主體意識對抗大中國意識，擬建構新國家，完成台灣本土化論述。陳水扁政府的施政政策大體仍延續李登輝主政時期的主軸，陳水扁執政後，企圖綜合「南北縱橫」與「強本西進」，在其「外交政策白皮書」中提出「新國際主義」——「藉由廣泛參與國際活動，以永續經營，厚實長遠友誼為務實策略、在新國際主義的主導下，台灣得以國際社會一份子身份，加入擁護和平，倡導安全，持續繁榮，維護人權，生態保育，及重視氣候變遷與人道援助等國際組織。在新國際主義的帶領下，台灣的新角色，將是一個崇尚國際主流價值，積極與國際交往，同時廣泛參與國際各層面事務的「國際秩序忠誠維護者」，絕非「麻煩製造者」。⁴⁶陳所提出之「新中間路線」企圖超越統獨爭論，並以「四不一沒有」——不宣佈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的問題等，做為其兩岸政策軸心，仍延續台灣本土論述，企圖超越大中國意識的政治文化框架，在全球化架構下，完成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徹底與中國大陸的主權論述切隔。

虛擬化的戰略目標，以經濟為主軸，不談政治，不碰政治問題，讓政治問題模糊化。新潮流系認為「大膽西進」政策輕忽了台灣本土化路線，於是提出「強本漸進」加以抗衡，以「歷史未定論」為出發點，主張台灣應凝聚全民共識，突破中共的外交封鎖，在經濟上，接受經濟民族主義觀點，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產業昇級，強化國民經濟自主性，與中國保持距離，避免被中國吸納。1998 年 2 月民進黨舉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各自修正自己的觀點，最後凝聚提出「強本西進」。「強本西進」主張，應與中共進行全方位的談判，而非只是三通議題的談判，其中更具體的主張是「不接受一個中國政策」，也認為主權不能作為談判的標的。

⁴⁵ 王崑義，*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台北：創世文化，2001 年），頁 59-86。

⁴⁶ 陳水扁，*新世紀、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 1*，民進黨中央黨部出版，2000 年，頁 121。

表 4-1：民進黨內「大膽西進」論與「強本漸進」論的比較

類別	大膽西進	強本漸進
提出派系	美麗島系	新潮流系
歷史觀念	歷史終結論	歷史未定論
國際形勢	冷戰結束，和解重於一切的國際秩序	冷戰結束，和解與衝突並存的失序渾沌狀態
安全保障	理想主義的集體安全體系	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或霸權主導體系
國際經濟	經濟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	經濟國家主義的國際主義
台灣危機	國際孤立、台海衝突	國民意識消蝕、國際地位矮化
促談壓力	存在、對台灣不利	存在、對台灣並無特別不利
對國際社會與中國態度	順應國際主流，不淪為國際異端，不挑戰國際現狀，不刺激中國，不談台獨	持續凝聚國民意識，突破外交封鎖
經濟戰略	以投資中國市場為主軸，帶動台灣產業升級的邊際效果	以國內投資環境改善，研發及教育經費的投入為主軸，來創造產業升級，強化國民經濟自主性
自保方案	以經濟整合、經貿互賴來牽動中國，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敵意，並暗中在中國製造利益團體，和平演變中國	與中國保持距離，避免被中國「經濟吸納」
談判主軸	以三通議題取代事務性議題，並迴避政治議題	從具體、不具體敏感性的議題展開強化對話及溝通機制

資料來源：林濁水，**測量台灣新座標**（台北：濁水溪基金會，1998），頁 122-136。

表 4-2：民進黨美麗島系、新潮流系「強本西進」的主張

派系	原先主張	修正後主張
美麗島系	就三通議題進行談判	三通談判—經貿談判—經貿+社會交流+事務談判—什麼都可以談 (全方位談判)
	台灣將面臨國際壓力被迫與中共進行談判 (單元論)	台灣在面臨國際壓力的同時，也將對美國及中共「反壓力」，但情勢仍不明朗，應妥善因應。 (雙元論)
新潮流系	從那裡中斷，就從那裡談起	接受全方位談判
	經濟議題應以辜汪會談內容為架構	經濟議題以目前台灣面對的經濟問題為架構

資料來源：聯合報，87年2月13日。

第二節 權力多極化

對於制度的追求，是人類普遍的願望，而制度是自由、民主最大的保障，儘管制度與國家一樣，在不同環境背景，可能出現自由與保守、奴役與民主之分，但制度是追求社會正義、自由民主最主要的守護神。國際組織也是在此種精神下逐步孕育出來，國際組織成立的目的是在於解決國家間無法解決的國際爭端，希望成立一種跨國組織消弭國家間的摩擦與衝突，目前雖然國際組織功能不彰，但不同類型跨國組織的成立，也代表人類希望藉由全球治理的實現，將導致戰爭衝突之可能性降至最低的努力。

1995年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界定治理為，「治理是個體與機構、公私部門處理其日常事務眾多方法的總合。」羅森腦也認為，世界政治的特色是無政府的治理。⁴⁷目前最重要的三個全球性國際組織

⁴⁷ Rosenau, James N. & Ernst-Otto Czempiel. edited.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

分別為：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經濟體系是全球治理思維的具體表現，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最突出的現象，也造成全球經濟治理形式產生轉變。80 年代以前，多邊主義是以國家為思考中心，雖與市民社會具有某種程度關係，但仍較注重通則化原則，⁴⁸一直到 90 年代以後，情況出現顯著轉變，在追求透明化與責任趨勢下，全球運動使多邊主義出現了新舊形式之分。

舊形式(現行)多邊主義是以國家為中心，國家的作為主導國際情勢的發展，全球治理是一種由上至下的關係。新形式多邊主義試圖在全球尺度上重整市民社會與政治權威，由下至上建立全球治理體系，新形式多邊主義對舊形式多邊主義提出的挑戰不僅是新形式多邊主義隱含制度的變革，同時也代表全然不同的一組利益。⁴⁹新舊多邊主義差異主要有三：(一) 新形式多邊主義仍未定型，仍依社會團體互動情況而定。(二) 新形式多邊主義由完全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團體擔綱，國家並非人民權益的唯一代表。(三) 新形式多邊主義代表後霸權之建構。新形式多邊主義代表以國家主導的思考方式之舊式多邊主義已不能滿足與承載後資本主義社會之各項需求，新形式多邊主義應運而生。新形式多邊主義具五項特徵：(一) 為回應市民社會修正不同制度；(二) 國際關係主要參與者的制度形式被衝突的動機與目標所瓜分；(三) 由於目標的對立，使制度和社會運動能完成的目標並不多；(四) 新形式多邊主義對國家造成重大衝擊；(五) 政策議題涵蓋更多的社會議題。⁵⁰

國家已無法獨享過去屬於它的主權、自主與權威，必需與非國家行動者、團體等共享權力，但並非國家就此消逝，而是國際因素影響國內政治、經濟條件，國內因素也常牽動與影響外部因素，更由於資訊快速流動，全世界各地都能同時知道與分享來自其他地區與國家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此導致過去較為侷限於國內的社會運動有國際化趨勢，國家已無法單獨解決具國際性的若干議題，必需由國際社會協力才能防範區域性或全球性皆有影響的問題，此也突顯了過去由上而下的國家社會互動關係，不僅在國內產生了質變，也影響國與國間的互動關係。在國際社會中，由於科技、資訊、通信電子業的發達，全球公民社會雖尚未達成，但由人民組成的公民社會已國際化，透過上述資訊工具，來自人民的下層力量已漸能蔚為一股力量，挑戰國家與正式組織的權威與行動，過去由上至下的權力配

⁴⁸ Rosenau, James N. & Ernst-Otto Czempiel. edited.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92, p11.

⁴⁹ Cox, Robert. edited.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Basingstoke:Macmillan/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xxvii.

⁵⁰ O'Brien, Robert, Goetz, Anne Marie, Scholte, Jan Aart and Williams Marc.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21.

置模式已過時，目前由下而上的新權力互動模式已成形，個人、國家、超國家組織與非政府組織間的互動創建多元、多層次的權力分享模式。

1867 年蘇格蘭國際法學家勞瑞莫(James Lorimer)首次提出「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概念，1908 年索欽(Walther Schueching)發表「世界組織」論文，國際組織一詞始被國際法學界使用。國際組織基本上是對內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間，透過協議，建立規範與規則，約束參與成員的行為角色，平衡各參與成員的期待，對外有能力代表其參與成員國處理相關事務的一種國際組織。⁵¹國際組織的形成主要由於情勢結構與權力結構，其中包括「主權」、「互賴」、「解決共同問題／達至共同利益」，以及「對國際關係情勢的認知」等四項條件。⁵²每個國家參與國際組織都有其潛在動機與實質考量，過去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性組織大概基於以下三個理由，第一，增加進入市場的通路，提高因理性化與專門化而產生的利益，第二，加強政治團結性(cohesion)，第三，拓展其它的貿易與經濟政策目標。⁵³有人認為全球化是世界走向大同的表現，西方全球論者霍克(Richard Falk)、赫爾德(David Held)更提倡將歐洲理論—政治術語—市民社會使用於國際社會之中，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使用之「全球性的市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一語也出現在聯合國的正式文件中，但霍克與赫爾德等人之世界性跨國民主政治仍未實現，將國家權力集中的內在邏輯，應用於國際組織身上是有問題的，超國家的至上權威並無法保證較安全與較和平世界的到來，將國內之權力邏輯關係類比於國際層面使用是不當的，⁵⁴包括杭廷頓(S. Huntington)與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等人皆認為「世界性的市民社會」並不存在。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仍有高度壓迫之可能性存在，此種分化(differentiating)與部門化(fragmenting)將有可能連根拔起「世界村」(global village)的統一性。菲勒史東(Mike Featherstone)、騰納(Bryan S. Turner)稱此將世界壓縮形成之文化參考架構，很難視為是種全球性文化(global culture)，而應該是種克里奧耳化(creolization)—由為數眾多的在地人口(indigenous populations)採用以為能形成秩序與共同性整合(communitarian integration)外來之技術、科學與工業(technical-scientific-industrial)之文化，⁵⁵但相對地，卻產生污染、抵抗與失序。拉多

⁵¹ 朱景鵬，**國際組織管理—全球化與區域化之觀點** (台北：聯經，2004)，頁 68-69。

⁵² 朱景鵬，**國際組織管理—全球化與區域化之觀點**，頁 82。

⁵³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3, p25.

⁵⁴ Zolo, Danilo. "The Lords of Peace—From the Holy Alliance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in Holden, Barry. edited. (2000), p75.

⁵⁵ 克里奧耳化強調不同文化的交叉影響，當地人由外來文化汲取一些特別的東西，賦予它們既有文化所無的新意涵，創造性地將它們與當地文化融合在一起，並創造出全新的文化。參閱 Robin Cohen & Paul Kennedy 著，文軍等譯，**全球社會學** (Global Sociology)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366。

謝(Serge Latouche)認為，西方霸權造成之文化全球化並未使世界整合在一起，相反地，卻使這些國家、地區與團體產生去文化(deculturation)現象，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國家，對文化全球化摧毀維繫其社會聯結所需之社會失序現象感受尤深，文化全球化使西方活似科技性的超級機器(technical-scientific megamachine)，造成國際分工體系功能性的分化，科技專門化的增加，但在全球共享價值之世界性文化則是失敗的。⁵⁶

國際組織是西方「世界政府」、「世界大同」與「世界村」構想實現的工具，但因全球化之共享普世價值仍未形成，全球權力之民主機制尚未成熟，國際組織仍是世界強權角力的場所，國際現實主義所謂的大國外交，仍未因全球化而壽終正寢，正因如此，台灣因應全球化而進行相關之去管制化、規範開放措施，更需多加一層國家安全思考，在國際現實主義邏輯下，我們無法也不應過份期待國際社會能跳脫國家權力與財富的思考模式，在不受干預情形下，獨對台灣之國際地位予以正常承認。台灣在爭取進入國際組織或與國際社會進行互動時，應注意國際組織與國際社會現實的權力、利益考量，方不會昧於國際現實，對國際組織的公平正義性過份的期待。

自威斯特發利亞條約訂定以來，民族國家便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行動者，民族國家成為合理壟斷國內外權力要素的唯一合法行動者，但是隨著國際組織的出現，國家權力在形式上受到了一定的制約，民族國家的權力內涵、運作邏輯與互動方式受到了實質上的影響。蓋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認為，權力的基本來源有三：人格、財產與組織，政府的權力可以分為二部分，一是對內行使最高治權的權力，二是對外行使獨立主權的權力，而這二部分的權力皆有賴於人格、財產與組織的現實依據—現存政府的部分或全部權力依賴於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與國際的現實依據。⁵⁷但民族國家並未因此消逝，國際組織創造了分享國家權力的機會，但若說全球市民社會於焉產生，似乎稍嫌樂觀，只要國際社會仍有剝削、依賴與不平等現象存在，國家權力現象就不容易由人類歷史上退場。追求和平與平等是人類集體的希望，但隨著認知、文化與發展程度的差異，追求和平與平等的方式便不同，國與國間的糾紛不斷，如西方文明與阿拉伯世界的嚴重衝突，雖說若干國家以世界和平、自由、民主為標的，干涉他國內政所引發的戰爭仍層出不窮，但為了和平與人類生存，國際組織一直是人類追求全球治理目標的有力工具。

國際政治中權力不平衡現象，經由全球化深深影響國內政治，包括政策制定

⁵⁶ Zolo, Danilo. "The Lords of Peace—From the Holy Alliance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in Holden, Barry. edited. (2000), p76.

⁵⁷ 施雪華，**政府權能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 104-105。

及其施行。可以說，現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自外於國際組織的影響，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已改變過去國際社會以國家為互動的基本單位，但國家的基本思考邏輯—權力與國家利益—並未就此改變，一些自由主義論者認為國家已至窮途末路，無疆界市場將突破國家疆界，多國籍企業、跨國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的出現，證明以國家為主導的國際政治已發生革命性的轉變。但由種種跡象顯示，自由主義似乎犯了理想主義的錯誤，權力與國家利益仍是國際社會的稀有物，或許國家的權力被分享了，但決非被取代，新加入的行動者所追求的仍是權力與國家利益。⁵⁸

新組織與主要經濟行動者未必取代國家，但造成重大變遷是無庸置疑的，國際市場和跨國企業結構並未必然想取代國家，但卻會對國家體系結構造成基本的質變。⁵⁹可以確定的是，權力的形式與組合多樣化了，但其本質並未改變，在全球經濟化過程中，國家更進一步促成解除管制、強化市場與推動私有化，但這並不會因此降低或減少國家的角色與功能，國家積極參與國際性議題不會削弱其能力，反倒會加強其經濟功能。⁶⁰國際政治並未因國際組織的出現，而使國際社會的衝突減少，相反地，國際間國與國的衝突形式反而更多樣化了，只是過去是以政治外交為思考變項，現在轉成為經濟而已，未來文化、宗教因素是否會成為重要的國家衝突指標仍有待觀察，如知名政治學家杭廷頓便認為，未來人類文明的衝突主因，是文化與宗教的衝突。

未來不管國際政治或國內政治，都無法以單一變項去加以規範與預測，而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差別只在那一種因素成了時程表上的主因而已。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亦有相同的論述，馬氏認為，政治決定經濟，或經濟決定政治都不能寄予太多的意義與遐想，而應該加上時空因素，也就是當時的政經因素才能對某一事件或現象加以掌控。譬如，一個國家應在何時進行經濟改革或政治改革，或企業投資何時該增加投資？何時該保守應對，完全看主政者或經營者的判斷，而其判斷應依據當時主、客觀的形勢判斷，而做出政策擬定，一個國家的成敗與一個企業經營的好壞，端賴主其事者對形勢條件判斷之良窳而定，一個失敗不合時宜的政策，將影響國家或企業未來的發展與存廢。政策無所謂好壞，而是要以時間點與適切性做為檢驗標準。

⁵⁸ 赫斯特·湯普森(Hirst, Paul & Thompson, Grahame)著，朱道凱翻譯，**全球化迷思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台北：學群出版社，2002年)，頁1-18。

⁵⁹ Ruggie, John Gerard.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1), pp139-147.

⁶⁰ Sassen, Sasia.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dustr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Mittelman, James H. edited. *Globaliz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7), p47.

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非國家組織，國家間組織已成為國際社會的行動者，各有各的成立目的，但國際間的衝突與新議題並未因此而減少，只是以不同形式競逐國際稀有財—權力與財富，國際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中仍扮演主要角色，而且國際因素影響國內政治、經濟的情況有加速的情況，如美國的對外政策，美國的軍事部署都深深影響國際政治的運作。就以美國遭逢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以其政經影響力強力主導各國加入反恐行列，並以各種行政措施，將反恐塑造成全球公平正義的象徵，不支持反恐就是國際社會的敵人，可看出國際政治仍是強國在主導，只是手法更為精緻與多樣化罷了，其影響層面將使全球的經濟與資源分配更不平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國與國的磨擦不再是以戰爭為唯一形式，國際外交場合、經貿市場、國際組織都是國家的能力與國力的展現，國與國的競爭不再是單純的以人口、土地、武器加以衡量，而需以綜合國力的展現，才能加以衡量，一個國家的強弱，應該同時考量人口的素質、產業狀況、企業競爭能力等。強國如美國、歐盟以其廣泛的政經網絡、強勢外交作為，將較為弱小的國家壓縮在此架構下，遵守強國所定之規範加以運作。

國家與國際組織互動可分為四種：(一) 國際組織中的外交。(二) 通過國際組織的外交。(三) 對於國際組織的外交，這部分是台灣踏入國際社會努力的指標。(四) 為了國際組織的外交。⁶¹表面上看來，低開發國家能經由國際場合維護本身利益，但事實上，除非強權首肯默認，否則低度開發國家並無任何與聞與訂立國際規範的空間，如台灣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就一再碰壁，更遑論是以一個國家的方式進入聯合國了。原因無它，只因國際政治仍是現實主義當道，以權力、國家利益為考量，低度開發國家仍是國際社會的邊緣人，依然遭受剝削，不公平待遇，並無任何翻身的機會。國與國間、國際社會的裂隙將會逐漸加深，不均衡現象將逐步擴大，國與國的衝突將藉由另一種形式出現。

全球化因經濟全球化而令人目眩，全世界皆依賴世界性的貿易組織解決國內外貿易所遇見的問題與困境，但事實上，這些國際組織解決國內爭端的能力著實令人存疑。事實上，只要是國際間爆發大規模的衝突或爭端，國際社會賦予國際組織解決爭端的能力隱而不顯，尤其是當此種爭端與國際強權利益息息相關時，國際組織還是需仰承民族國家鼻息。就以美國以反恐為由攻打伊拉克為例，我們看不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能有多大的作為，倒是可明顯看出國家利益隱藏在自

⁶¹ 橫田三洋原著，楊正綸譯，**國際組織論**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85 年)，頁 9-11。

由、民主、安全的說辭背後，平時國際組織四平八穩，但在衝突時刻來臨時，卻突顯出國際組織的無力感。⁶²

國際組織本身亦難脫組織集中、保守的特質，國際社會成員並非想參與國際組織就能如願，如台灣想加入國際組織，便常因中國大陸從中作梗，而不克如願。譬如，成立於 1995 年，目前已有 134 個會員國之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人類有史以來被賦與最多權力之國際組織，本身便具有完整之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該組織不止整合 20 個國際協議(包括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且能對不遵從該組織目標或規定之會員，施予一定程度的制裁。對於爭端之解決則透過其爭端解決體(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加以解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正常擴張，就像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儘管經濟全球化被認為是自由化的全面勝利，但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剝削現象並未見稍戢，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情況。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後進工業化國家儘管在自由化過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本身淪為強國的附庸而不自知，全球經濟化並未使其脫離政經被剝削的狀況，反而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在全球產品分工體系下處於出賣勞動力的一群，仍未脫離被奴役的宿命。

國際組織是國際社會的新貴，與多國籍企業一樣，強力主導民族國家的運作與存續，各種國際組織在冷戰與後冷戰時代大量出現，國際組織成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過去對國際組織的研究並不熱中，直到與孟德斯鳩、涂爾幹、韋伯思想一脈相連的建構主義出現後，世人對國際組織才又進一步加以認識，但在界定與倡導國際組織的原則與價值時，亦未清楚認知國際組織的主要角色為何。國際政治經濟學學派認為，霸權可經由國際組織穩固其在國際社會中之文化霸權⁶³。有些人將國際組織視為國家權力的延伸，為保護國家權力之主要代理人。另有些學者則認為，國際組織可視為是一種論壇機制的建立，使其成員國可透過此一機制，進行協商、討論合作事宜。⁶⁴

國際力量對於型塑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但國家並非就全然處於被動地位，國家也可能影響國際體系的運作。台灣是除了教廷以外唯一尚未進入聯合國的主權國家，國際社會昧於國際現實並不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台灣卻仍服膺遵守國際社會應守規範與分際，國際社會也會針對此種國際現實給予台灣不公平待遇。比如台灣在軍售與國外技術轉移方面，就必需花費比其他國

⁶² Harris, Errol., Yunker, James A. *Toward Genuine Global Governance—Critical Reactions to “Our Neighborhood”* (Praeger, 1999), p48.

⁶³ Pierre de Senarchle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170 (December 2001), p510-512.

⁶⁴ 朱景鵬，*國際組織管理—全球化與區域化之觀點*，頁 106。

家更高費用才能順利獲取軍售與技術移轉，但台灣也並非全然處於受支配地位。就以華航購機案而言，辜且不論中華航空公司最後依「國家利益」購買歐洲空中巴士或美國波音，可以看出，只要台灣仍擁有一定經濟優勢，仍可在大國外交架構下保有適度生存空間。

國際組織成爲強國權力觸角的延伸，或許自由主義者所說的沒錯，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是已分享過去由國家獨享的權力，但卻仍無法完全取代國家的作用，事實上，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思考邏輯，仍未跳脫過去民族國家權力、財富運作模式。就以國際民航組織爲例，對於亞洲地區國家而言，國際民航組織在世界各地所推行的標準化與國際化，便有干涉該國內政與組織正常運作之虞，因爲國際民航組織所定下的標準與附約、文件規定，在歐美地區的國家都未必能符合該項標準與程序，但在亞洲地區卻以高規格與高標準加以落實，對於國際民航組織所定下標準，這些國家率皆都以高規格、標準對待，投入相當大的物力與人力，希望達成國際化與標準化，但卻往往罔顧能加以落實的能力與配合之人力資源、歷史背景因素，相關單位所有的資源與人力都需全部投入不確定性甚高的計畫與程序標準，而基本的空運安全需求標準，反因資源、預算的擠壓而得不到實質的改善，在國家預算緊縮下，人員福利與維繫組織正常運作所需的基本預算，反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政府機構投入過多的人力、資源於國際組織的輸出上，而其背後所代表的就是強國利益集團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

若干國際組織已足與個別國家呈分庭抗禮的態勢，但若干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危機是否可藉由國際組織的介入加以解決，筆者抱持懷疑態度。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各方有不同的解讀，新古典經濟論者認爲，亞洲金融風暴之所以產生就是國家介入太多，亞洲金融風暴代表國家資本主義或新重商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終結，而修正論者卻認爲，短期資金流動才是真正原因，是管制不夠而不是過份管制，才是危機產生的真正原因。但無論那一種說法，都難以掩飾國際金融組織，並未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當際，便做出該有的反應加以處理，則是不爭的事實。若非亞洲地區國家主動積極加以介入處理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

國際組織本是種未成熟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並且深受國家權力的影響，目前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權力與財富足以解決全球的經濟問題，目前國際組織因資訊、資金、人才、技術的快速流動，再加上國與國間的互動頻繁，更需要國際組織此種國際性的公共論壇的存在，讓各國得以在國際場合，爲其國家利益與政策加以辯護。⁶⁵但亦無需對國際組織抱以太大的期望與功能，因爲國際組織的異質

⁶⁵ 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5.

性、差異性實在太大了，期待一個國際性組織，解決國內面臨的政經問題，無異痴人說夢，國際組織其合法性或強制性功能一直是世人質疑的焦點，因為國際組織的運行法則，皆顯示強國的擴張邏輯，儘管後進發展國家可藉由國際組織突顯某些不公平與歧視性剝削，能對國際社會強烈表達其國家政策，但若無強國的支持，決無法維護其國家利益，而強國在制定外交政策與全球經營策略時，其道德因素考量能否突破國家利益的牢籠，則是不言而喻了。在國際組織仍未能脫離國家利益的邏輯思考模式時，國際組織對後進發展國家之正面功能與意義是令人懷疑的。

全球性經貿組織根本無法消除世界的歧異與問題，相反地，反而加深了彼此的衝突，全球性經貿組織的主導成員國，以經濟自由之名，行類似西方中古世紀十字軍東征之實，跨越國界的經貿組織，國際性勞動分工使國家、個人的主體性產生錯亂與迷失。在世界上各個國家發展的條件與程度迥異的情況下，以世界性的國際政治組織如聯合國，世界性的經濟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等進行全球治理，達成消除國與國界限，與透過跨國組織解決國與國的政經摩擦，究竟能有多少效果著實令人懷疑，有時反成為強國干涉他國內政口實罷了，長遠看來，反而造成了彼此長久的對立仇恨。

第三節 區域化現象

目前國際社會仍是以國家體系為基礎，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仍是國家追求的目標，全球主義⁶⁶仍遙不可期，各國為期能在全球化浪潮下仍保有競爭力，深怕被排除在國際合作、互賴圈外，紛紛以結盟方式進行合作，區域主義就在此種背景下形成。60年代發展中國家曾以「不結盟運動」與「77集團運動」抵抗先進發展國家加諸於它們的限制、壓迫與再次殖民現象，但由於各國發展條件與發展程度差異性極大，而使彼此的意見與利益不易整合，這就給區域主義再次創造了機會，再加上全球經濟化的發展，不僅各國實有彼此相互合作才能解決單一國家

⁶⁶ 全球主義首次出現於1970年代早期，直到1980年代全球主義已成為全球共同的目標。全球主義是普世與整體性的價值，全球化過程處理的是整個系統，而國際化過程是以國家體系為範圍。全球化無論在文化、政治與生產方面之觀念或方法論都令人震撼。全球化也是種意識型態，70年代中期，國家處理生態、生產與資源方面的能力皆出現瓶頸，對於全球未來整體的關切與作為，便成為全球主義(全球性思考，地區性行動)，全球化與全球主義成為思考與行動取向。全球化與全球主義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首先出現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請參閱，Worthington, Richard.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Production, Politics, Actions* (Peter Lang, 2000), pp17-24

所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發展中國家也意識到，惟有透過區域性、集團性合作才不會被邊緣化，各國透過國際性與區域性組織尋求合作管道與解決爭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國家大都致力於本國的建設，無意參與美蘇的兩極對抗，率皆採中立主義，但隨著美蘇對抗的熱化，新興國家已無法自外於美蘇對抗之外，採中立不結盟立場，美蘇對這些國家競相展開爭取聯盟，再加上新興國家時有衝突，爲了遠離殖民主義、霸權、帝國主義的威脅，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新興國家彼此合作的意願大增，誠如新加坡李光耀所言，殖民主義的結束，並不保證社會與經濟的進步，而僅是爲進步提供了某種程度的機會，必需重新思考建立各種組織和機構，促進發展中國家更有效、更現實、更實際的合作發展。⁶⁷但隨著冷戰結束，全球軍事安全型態與佈署又再度產生變動，似乎又回到 20 世紀末多極權力政治型態，當前體系有別於 19 世紀末強權對立漸趨全球化的多極國際體系，逐漸形成更區域化、更分裂，更缺乏系統的新體系型態。世界體系分割成相對分離的區域安全集團。⁶⁸

再者，經濟全球化使相互依存成爲不可逆轉的趨勢，遂導致區域主義在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盛行。但盛行於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舊」區域主義與 90 年代的「新」區域主義有相當不同的地方。「舊」區域主義爲冷戰的產物，具內向性和排外性，係各國爲了特定的安全或經濟目的所設置的，而「新」區域主義是外向的、不排外的多層次功能特徵的。⁶⁹帕爾默(Norman Dunbar Palmer)在「亞太地區的新區域主義」(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一書中提出，舊區域主義以西歐爲代表，希望走向全面一體化、弱化國家主權以及聯邦主義；而亞太地區則是「新」區域主義的主要代表，主要是因應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相互依存，以及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民族主義所引發的趨勢。⁷⁰

在全球政府尚未達成之際，區域經濟、區域組織的發展對於國家與地區性權力、資源配置與合作是必然的發展。由於國際主義(universalism)發展並不順利，但基於國際合作與經濟發展互賴性的加強，皆使區域主義(regionalism)快速的興起。在國際合作日趨頻繁之際，每個國家都害怕被邊緣化，惟有透過彼此的合作與結盟才能最大化彼此的利益，也惟有透過彼此的長期合作，才能達成較爲長久的和平。但區域發展不必然是國家發展與國家競爭力的萬靈丹，區域發展有其向心力與離心力，若完全想依賴國際社會的善意，恐將使國家與民族淪爲受奴役的

⁶⁷ 陳岳、陳翠華編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頁 150。

⁶⁸ Buzan, B. **People, States and Fear**. (Brighton: Harvester, 1991), p208.

⁶⁹ Buszynski, Leszek. "Asians New Challenges," *Pacific Affairs*, Vol.70, No14 (Winter 1997-1998), pp555-556.

⁷⁰ 馬嬰，**區域主義與發展中國家 (Regionalism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31。

情況，區域發展有時代表的是更為激烈的競爭，只是競爭形式不同而已，只要權力與財富的本質不變，則區域發展對每一個國家是必要的，但不見得都是有利的。

全球化導致區域發展日益普遍，每個國家為了維護其權益，都盡量成立共同組織，共同謀求本身最大的利益，這也是國際組織一直無法消除的問題，當然，有許多的問題已非單一國家就能完全面對與解決的，如高布萊特(David Goldblatt)所說的，全球環境污染問題是跨國界的，而且會導致地球溫度的提高，再者，環境惡化的情況，會影響人類整體生存環境，環境問題已成全球政治問題，必需由國際社會共同解決，但同樣的，區域發展也不盡然就能解決會員國所面臨的問題，原因在於每個國家的發展條件、方向與能力皆不盡相同，弱勢的國家仍無法經由合作便能保證脫離受壓迫的情形，國際社會仍是現實主義思考與作為的，權力的本身便有壓迫與宰制的潛存因子在裏面，短時間看來，區域發展是會員國成功發展最佳保證，但長期而言，區域發展所發展出的區域性經濟組織，仍無法脫離政治力思考，無法脫離政治力思考，則經濟就必然仍服務於政治，惟區域合作與區域組織對政治弱勢國家長期言仍利多於弊。

就以台灣而言，台灣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就極力想將台灣問題國際化，新政府亦不例外，希望藉參與國際性組織與活動，期待國際社會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由於區域性組織與合作仍為經濟性居多，最大獲益者仍為大國，弱國想經由國與國的合作，脫離低度開發的階段不易達成，後進國家想要發展除非國家與社會能彼此合理的鑲嵌，否則不易超越既有的依賴性發展。在相當多的時機中，區域組織會員國仍是以政治立場處理經濟問題，這也就是台灣目前無法突破中共圍堵的真正原因。納許(Kate Nash)就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政治過程，而非準自然(quasi-natural)的資本主義發展。⁷¹

區域發展其實就是「全球化在地化」的具體呈現，區域性發展的趨勢與現況成為決定台灣未來發展極為重要的外在因素。中國大陸於 1991 年低調進入亞太經合會(APEC)，經過 20 年努力耕耘，已成為亞洲地區的區域強權，中國大陸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有其經濟、政治目的，最主要仍為其國家利益持續地擴充，在亞太經合會中爭取中國大陸最大的國家利益，如賴恩所說的，任何國家在經濟有所突破時，便會考量平衡霸權的地位，進而想主導取而代之，並演變為多個強權的現象。中共加入亞太經合會當然有其經濟目的，但亦有其政治目的，中共可以利用其參加亞太經合會的機會，與其他會員國領袖代表溝通彼此的想法，改善其他會員國對中共成為區域性霸權產生的疑慮。中共不僅利用亞太經合會的最惠

⁷¹ Kate Nash 著，林庭瑤譯，**全球化、政治與權力：政治社會學的分析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ology: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nd Power)** (台北：韋伯文化，2004)，頁 iv。

國待遇改善其經濟面臨的困境，同時也爭取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的認同，進而壓縮台灣外交空間，事實上，亞太經合會可說是中國大陸累積其政經實力，爭取區域認同，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進一步的關係，以便與美日相抗衡的區域經濟論壇。⁷²中共期利用參加亞太經合會與世界經濟與國際社會接軌，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完成其經濟目的後，再擴充其政治目的，誠如新現實主義者克來斯納(Stephen Krasner)所言，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活動是自主的，⁷³「區域合作」與「區域組織」仍是國家權力競逐的場域與互動方式。

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會持續尋找低工資、新的消費市場，資本主義本身便具擴充性，並創造出新奴役與新剝削。對每一個國家而言，區域發展與區域整合同時存在主動與被動的動能，就如台灣，爲了經貿發展、工業轉型及未來國家整體發展計，在區域發展的趨勢下，勢必重新與中國大陸建立政經互動關係，目前由於兩岸仍處於敵對狀態，過去雙方賴以互動的「九二共識」，已隨 96 年飛彈危機，而使雙方的互動模式與最基本的信任度盪然無存。台灣之所以無法拒絕與中國大陸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互動與經濟合作，就在於中國大陸已成爲區域性霸權，再加上中國大陸廣大市場與潛在消費能力，在經濟上，台灣是無法完全與中國大陸切割開來的，在社會上，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中華民族，同文同種，在歷史、文化、血統等都無法完全脫離開來，由於經濟性需求，導致政府在處理政治發展與國家定位問題上充滿矛盾、無奈，不能急統也無法急獨，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太左成爲台獨，太右又成爲中共同路人，賣台集團的代言人，使原本單純的區域性經濟功能整合的過程，演變成爲主權與國家定位之爭，這是台灣在區域發展與東南亞、東北亞國家建立正常經濟、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成爲高度政治敏感議題的真正原因。

爲使有限的資源進行最有效率配置，國與國間、區域與區域間，社會團體與個人的需求，都能在最有效率、最快速的方式得到最大的滿足，彼此的發展與整合就成爲不可避免的趨勢。但由於每個國家與區域發展的程度與歷史條件、文化背景的差異，皆增加區域發展與整合的困難度。衡量區域主義的發展程度，一般皆以「整合理論」加以分析，因爲區域主義的發展往往是藉由區域整合的。⁷⁴整合理論中的功能主義認爲，區域整合應由下至上，以該社會之利益需求，與其他國家進行較低層次技術性、功能性合作，日後達到整合的目的。

⁷² 王朝才、傅志華、隆武華，「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安全」，收錄於，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頁 188-199。

⁷³ Krasner, Stephen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3 (April 1976), pp317-343. 轉引自，吳玲君，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四十卷第三期(民國 90 年)，頁 4。

⁷⁴ 朱景鵬，**區域主義理論基礎與相關學說**，請參閱，<http://goglobal.myrice.com>

功能主義主要論點有二，第一，強調國與國間的互賴性，經由彼此功能性合作，如梅傳尼(David Mitrany)認為，功能性合作將產生分支(doctrine of ramification)、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某一部門的合作，將是另一部門合作的誘因。第二，在整合過程中，人民會發現區域性組織能處理與應付單一國家所無法解決與處理的問題，所以人民會改變對國家的認知與忠誠度轉向認同區域組織。⁷⁵但新功能主義者認為，功能主義所提出的外溢效果，如何由經濟功能面提昇至政治面，如何由低度政治提昇至高度政治，在解釋與實務上皆出現困境。巴拉沙(Bella Balassa)在「區域整合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一書中提出，區域整合的階段如下：(1) 形成自由貿易區，區域內會員在區域內無貿易障礙。(2) 關稅同盟。(3) 共同市場。在區域內，生產要素與資本自由流動。(4) 經濟同盟。統一經濟政策、市場規範、宏觀的經濟政策、貨幣政策、所得再分配政策。(5) 貨幣同盟：單一貨幣市場。而一般的整合包括：(1) 主權國家是國際整合最主要的行動者。(2) 區域內貿易增加國家獲利率。(3) 整合由自由貿易至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同盟。筆者認為，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的區域整合看法有可參考之處，但若應用於兩岸關係則仍有落差。兩岸的政治對抗，使最基本的經濟交流都不易達成，更遑論高層次的政治交流了。要突破此種困境，當然有賴雙方領導者以更宏觀的歷史向度處理雙方的歧異，才有可能成為穩定區域發展的力量。

全球化使世界經濟形成三大區塊，美國、日本與歐盟。史塔林斯(Barbara Stallings)指出，全球經濟的集中化與區域化現象，使經貿與投資在三邊區域—(triad area)—美國、日本與歐盟內都有增加，其他區域在此過程中則逐漸被邊緣化，三個區域內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造成不同的經濟表現，既有衝突與合作、分散與聚集。⁷⁶全球化將財富、權力與技術重新分配，形成高度變動、高度排外與非常不穩定的結構，所有的國家與區域處於激烈競爭之中，全球經濟快速資訊化，形成全球資訊科技網絡社會。⁷⁷夏鑄九教授表示，網絡社會是資訊時代的特徵，它以全球經濟的力量，徹底動搖以固定領域、空間為基礎之民族國家或任何組織的形式。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據以出現，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取代了固定空間。⁷⁸資訊科技使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產生鉅變，連帶地也使全球經濟產生

⁷⁵ Mitrany, David.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hicago: Quarangle Books, 1996), p96.

⁷⁶ Stallings, Barbara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velopment,”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velopment, No. 1, p21.

⁷⁷ 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等譯，*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頁 108-109。

⁷⁸ 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等譯，*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頁 XVI-XVIII。

質變與量變，在全球化過程中，每個民族國家都已意識到，單靠一國的力量是無法再面對與處理內外政經情勢的挑戰，爲了在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佔據一定競爭位置，互惠與互賴成爲普世價值，各個民族國家莫不爭取與其他國家進行經貿合作，藉以提昇、爭取全球競爭體系中之有利位置。但由於推動貿易自由化之多邊模式並不順利，已逐漸式微，於是各國已以洽簽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方式尋求合作。

政治性經濟思考再加上國際現實環境的箝制，使台灣與其它東南亞國家簽訂互惠協定並不順暢，台灣顯少能藉由互惠合作的方式，與其它國家簽訂有利我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的協定，在資金積累、人力發展、勞力市場、資訊互惠等重要經濟生要素方面，台灣已居於劣勢。無論是東協十國原預定於 2010 年成立之自由貿易區，或於 2003 年 10 月 8 日決定將於 2020 年進一步成立類似歐盟的組織，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東協加一(中國大陸)，或東協加三(中國大陸、南韓、日本)，台灣都無法參與。根據克魯曼(Paul R. Krugman)和奧布斯菲爾德(Maurice Obstfeld)的「標準貿易模型」(The Standard Trade Model)，(一) 區域經濟整合內國家之間的貿易會增加，位於區外的國家，所生產的相同產品，由於要附加關稅，價格相對較高，競爭力降低。(二) 區內國家彼此的免稅措施，將降低生產資源的相對價格，競爭力相對提高。(三) 區內市場擴大後，將產生產業分工與規模擴大的效應。(四) 成立自由貿易區後會擴大吸引外資的投資，投資者可獲得區內相對廉價生產資源，並爭奪區內擴大的消費市場。⁷⁹凡此都是不利台灣未來發展的因素。當然，區域經濟整合並不能擔保台灣一定能成爲已開發國家，但若被排除於區域經濟合作的話，台灣立刻面臨被邊緣化的命運，除非台灣能發展出先進科技、資訊產業。

長久以來，台灣甚至中國大陸都無法脫離美國的影響，美國對台灣內政與兩岸關係的發展，事實上皆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美國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基本立場爲不急統、不急獨或反對中國大陸對台動武，但也反對台獨，鼓勵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目前美國爲世界的首強，其內政與外交政策深深牽動兩岸關係未來走向。⁸⁰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結合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具體實踐。美國處理兩岸關係是以其國家利益與全球戰略爲基本考量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曾表示，美國會爲防衛國家利益而戰，並爲促進自由貿易地區經濟的成長與政治開放而努力。⁸¹中國大陸的政經發展，無時無刻不影響著台灣

⁷⁹ 高孔廉、鄧岱賢，「區域經濟整合給台灣經濟發展的啓示」，*國家政策論壇季刊* (台北)，(民國 93 年 1 月春季號)，頁 116-122。

⁸⁰ 吳安家，「論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收錄於，*遠景季刊*，第三卷第三期 (2002)，頁 137

⁸¹ Rice, Condoleezza.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No. 1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46-49.

的發展與轉型，外國資金與人才不斷快速地投入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造成台灣市場人才與資金的嚴重失血，不僅國人投資意願低落，連外資也因國內政經情勢考量而有投資減緩情形，國內外企業往中國大陸移動、設廠已是不爭的事實，以中國市場的規模這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但台灣要以何種策略、佈局才能穩住陣腳，避免被邊緣化才是重要的。我們無法左右中國大陸成爲世界最主要的投資市場，但我們可以經由某種策略與佈局，使台灣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成爲重要的一員，前行政院經建會主委江丙坤就表示，台灣只在部分科技產業、會計服務、金融服務、國際貿易具世界次要核心地位，其他部分則仍只是扮演邊陲與半邊陲角色。

台灣不是大陸型國家，無法處處與大陸型國家爭鋒，但獨特的發展類型與既有的基礎建設，使台灣仍能在國際競爭下存續發展。國家的發展過程本來就不是條坦途，重要的是國家與社會如何對未來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共識，並依此共識，營造未來發展基圖。中國大陸對台灣最大的影響力就出於其大一統的思考模式，目前仍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商圍政的策略，爲其統一台灣立場步步進逼，中共國台辦在陳水扁 2004 年連任就職前夕發表新對台政策，是近來對台政策最爲強硬的表態。⁸²中共也對若干綠色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案加以阻撓，台灣奇美企業在中國大陸進行的投資案遭受封殺就是典型個案，在中共對台政策內外進逼下，政府在內政與外交的作爲勢必更爲艱辛。

中國大陸影響台灣轉型與發展的政治因素爲何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已然落幕，第四代領導人正式接班，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先進的文化、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成爲中共指導思想，「新三階段論」正式寫入十六大政治報告，這都是中國大陸影響台灣未來發展的政治因素。由其發佈的各項文件可以看出，中共統一台灣的意圖甚爲明顯，沒有任何改變，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能否緩和最基本的底限，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主權與領土是不容分割的。兩岸關係能否進一步改善，關鍵在台灣是否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主體意識隨著民主化持續提昇，而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經濟改革與國力的增強，對台灣強調主體性的內外作法，所表達的立場越來越強硬。中共的

⁸² 此七點對台政策爲：(一) 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二) 以適當方式保持兩岸密切聯繫，及時磋商解決兩岸關光衍生的問題。(三) 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以利兩岸同胞便捷地進行經貿、交流、旅行、觀光等活動。(四) 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互利互惠。(五) 進一步密切兩岸同胞各種交流，消弭隔閡，增進互信，累積共識。(六) 在兩岸關係的祥和氣氛中，台灣同胞追求兩岸和平、渴望社會穩定、謀求經濟發展的願望得以實現。(七) 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問題，共享中華民族的尊嚴。

政治思維方式有其一定的歷史條件、背景，但中共領導者也應考量主權與領土的觀念應該是動態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大陸方面應體認台灣過去那段殖民悲痛的歷史，與不同的發展經驗，任何一方想以一種意識型態或思維模式，悍然抹殺對方的生存空間，並以暴力脅迫方式製造出統一的效果，而非以生活方式、文化價值、類似的價值觀，拉進兩岸的差距，其結果可能都是中華民族的悲劇。無論是中國大陸所堅持的，或台灣方面所想的，若無法以更寬容，更大的歷史格局去思考的話，則兩岸兵戎相見的可能性，將隨著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與強權心態日益升高，我想這決非兩岸多數人民所樂於見到的。

由於兩岸政治的對立，致使兩岸無法發展出正常互動關係。三通(通商、通郵、通航)本是經濟問題，但放在兩岸的政治天平上，卻成爲政治議題。三通對台灣的重要性，遠大於中國大陸方面的需求，三通目前是象徵意義多於實質意義，由於政治因素作梗，在中共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下，仍不易有所突破，兩岸春節包機需經第三地才能在中國大陸降落，便是台灣當局礙於政治因素考量不得已的變通辦法，各界雖然殷殷企盼三通能早日完成，但由於雙方的政治堅持，三通問題將仍是朝野雙方攻防的焦點。台灣對中國大陸的依存度越來越高，由資料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百分二十五左右，而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中國大陸總進口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八左右，而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淨投資額更累計至八〇〇億美元以上。⁸³台灣經濟成長指標將受三通與否直接影響，目前台灣已進入轉型關鍵期，中國大陸已成爲影響台灣生存的重要外部因素，如何與大陸進行「政治式的經濟發展」，不僅考驗著執政黨的政治智慧，也決定台灣的永續發展的可能性。2001年11月上旬，兩岸分別於10日、11日成爲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144會員國，入世後，兩岸勢必在經濟互動上有所調整。台灣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不僅面臨全球產業的衝擊，也需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找出自己的發展定位點，由於中國大陸快速的成長，台灣如果因政治或意識型態因素造成自我發展瓶頸，可能會出現失位(mislocation)危機，也就是「地區輪替」(regional recycling)現象。⁸⁴

透過文化與經貿往來增加兩岸互動性，仍不能放棄與低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國家利益與商業利益是不能等同看待的，政府不僅需提供企業發展生存的空間，但也必需考量全民共同利益與福祉，在追求兩岸進行三通直航，以增加與疏通台灣內部資金流通與企業、產品升級時，仍需顧及與正確看待兩岸經濟發展的互補性與競爭性，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不能忽略中國大陸特

⁸³ 余德培，「全球與兩岸效應，從宏觀調控到五一七強硬表態，中共測出台灣政經能耐」，**聯合報** (台北)，93年5月18日。

⁸⁴ 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頁13。

有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間的互動變化，中國大陸的產品與技術水準已快速升級，決不甘也不願成為台灣勞力密集產品的腹地，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至一定水平，勢必對台灣內外發展與生存空間形成擠壓，中國大陸對台灣在軍事、意識型態仍甚具敵意的前提下，台灣仍需以整體策略考量，面對兩岸經貿交流。⁸⁵

如同赫爾德(David Held)所言，現今國際秩序的特色為堅持主權國家體系與多元權力結構的並存發展，⁸⁶而無政治統一的整合性區域市場，或許是未來世界體系的發展方向。⁸⁷果若如此，則在自由市場與集體安全的世界中，小國將能控制自己的政治與文化前途，大一統的文化思想模式，應有調整與變化的空間。台海兩岸因政治對立，目前仍處敵對狀態，短期內仍難有突破之可能性，但筆者認為，只要自由市場仍是全球經濟體運作的主要命脈，多元性、互賴性仍是後冷戰時期多數國家的共識，則台灣不應在區域經濟整合中缺席，經由與其他國家多層面的經濟、文化與社會交流，將更突顯與確保台灣經濟、政治民主化的世界價值。

第四節 小結

全球化是制約全世界發展的外部結構，台灣為世界的一員當然亦無例外。全球化對國家基本功能的衝擊是不言而喻的，全球化是一複雜現象，目前學者對於全球化現象仍難獲致一致性定義，但對於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延伸的說法，仍應予以一定程度的認同，因為無論是國際社會或國內社會不公平、不正義仍持續惡化，全球化並未能對貧富不公現象加以，因為國內、外政經資源，確實由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國際金融集團等所掌控，全球化原本想解決貧富差距，資源不均分配現象，但反加劇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之不公平現象。

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衝擊甚大，支持市場萬能人士，甚至已喊出無疆界市場的口號，國家已終結，歷史新紀元屬於自由市場的看法。的確，全球化代表的是世界體系結構全面、深度轉型，過去獨屬於民族國家的主權、自治權，已因各種

⁸⁵ 陳博志，「兩岸經濟關係在台灣國際經濟關係中的定位」，收錄於，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頁 91-103。

⁸⁶ Manuel Castells 著，*認同的力量*，頁 335。

⁸⁷ Evers, H. "Trade, Market Expansion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Compared," in Evers, H. and Schrader, H. edited. *The Moral Economy of Trade: Ethnicity and Developing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234-235.

國際性跨國組織的成立而急速消逝，跨國企業使資本流動更為快速，更為全面，資本的自由性、投機性充分展露無遺，出現史瑞奇(Susan Strange)所說的「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現象，全球網絡使資訊流通更無遠弗屆。但無論全球化、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如何削弱民族國家的影響力，由種種證據顯示，民族國家若干功能仍是國際組織與跨國企業無法替代的，國際組織本身並無擁有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所以在國際爭端與國際衝突出現時，仍待國際強權的介入與主導，才可能解決國際爭端。⁸⁸事實上，只要是國際社會仍由民族國家組成，則無論是跨國公司(TNCs)、國際政府組織(IGO)、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皆無法完全取代國家的功能，國際組織皆仍是強國維護其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的工具。

隨著國際合作的加強，互賴已成爲各個國家維持發展必需採取的作法，爲某區域內共同利益而出現之跨國合作屢見不鮮，區域經濟整合已成爲一種趨勢。惟任何一種以經濟爲手段的區域合作、整合，皆不能以純經濟面看待，其間必定隱藏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國與國間的合作亦潛藏相當多的利益衝突，有時候合作並不代表衝突就此消除。亞太地區主要有三種區域主義存在，(一) 先進工業化國家在亞太地區推動的亞太主義。(二) 東協國家提倡的東協主義。(三) 中共與日本所強調不同內涵的東亞主義。而事實上三種區域主義存在著既聯合又衝突的關係。⁸⁹

中國陸續與東協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不僅對簽訂國家是重要的，對東亞國家也有其一定的衝擊性，尤其對台灣的影響更不在話下。⁹⁰各國積極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主要考量爲，(一) 減讓關稅。(二) 投資自由化的利益。(三) 擴大貿易投資機會。(四) 促進會員國間的經濟成長。(五) 抵制其他區域貿易協定帶來的不利效果。⁹¹對於中國大陸積極與東協推動自由貿易區作法，短時間內因兩岸政治對立情況仍未解除，台灣很難納入此種合作機制，惟台灣若未能參與地區性區域經濟整合，未來的發展將極爲不利。東協加三機制的形成，代表以更爲制度化的方式建立亞洲國家溝通的管道，提昇整合亞洲區域經濟能力，以便因應全球經濟的挑戰。⁹²台灣如何突破中國大陸的經濟圍堵，重新調整投資發展策略，是政府需審慎思考的問題。

⁸⁸ Giddens, A.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pp283-290.

⁸⁹ 蕭全政，「全球化下亞太政治經濟發展之前景」，*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二十四卷第六期（民國90年6月），頁22-25。

⁹⁰ Yin, Xiangshuo. "The Impact of The China-Asian Free Trade Agreement On Regional Trade," in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XVIII, No.2. Fall/Winter (2004), pp311-333.

⁹¹ 王文娟，「區域化發展趨勢」，*經濟前瞻*，2001年9月5日，頁47-49。

⁹² Kwon, Yul. "East Asian Regionalism Focusing on Asian Plus Three," in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XVIII, No.1 Spring/Summer (2004), pp98-119.

